

94岁交代后事，才打开锁入箱底的功与名

“张富清式”的老英雄严传梅：深藏军功几十载，毕生积蓄交给党

本报记者王若辰

“我和二十几个村民被日军抓去了。我当时只有14岁，个子也小。有人训我们，说见到日本人要喊‘太君’，要弯腰鞠躬，不然就要杀头。日本人来了，别人都弯下腰去，把我露了出来——我腰板挺直，坚决不向烧了我们全村的日寇鞠躬。”

“我是家里的独儿子，就在心里使劲儿盘算如何脱身。一个日本兵把我叫出来，让我拉运他们抢来的东西。我一看，日本兵穿着皮靴，靴上还有钉子，而我穿着布鞋，这里又是石头山，跑起来肯定比大钉靴利索。瞅准机会，我撂下东西就往山里跑。日本兵追了好几里路，没追上我，还打了三枪，也没打中。”

“‘严传梅回来了！’十里八村都传开了。我不鞠躬，不喊‘太君’的事也传开了。在这之后，我就被派去侦察日军的布防情况，凡是有日本人出入的地方，我都想方设法去侦察情况。”

谁是谁的严传梅？直到去年在病中以为自己时日无多，拿出珍藏一生的皮箱，人们才第一次知道，这位已94岁高龄的老人，不仅仅是工作认真、受人尊敬的武汉大学离休干部，更是一位在淮海战役中荣立特等功，获得过“人民功臣”奖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的战斗英雄！

为了保家卫国，他15岁入党，16岁上战场，深入虎穴活捉汉奸，随时准备牺牲；

在淮海战役中，他以“现身说法”教育感化俘虏，为连队在减员严重的情况下迅速补充兵力、持续保持战斗力立下汗马功劳；

打仗落下腰伤，因为“当军官不能身先士卒怎么能行”，他转业到了高校，岗位不停“跨界”，他始终“得高分”，还善于给大学生讲党史，一讲就是一辈子；

如今，因为“自己老了不能再作贡献”，他给老伴留下必需的生活费后，把毕生积蓄交给了党。

这就是严传梅。

投向战场

1926年，严传梅出生于湖北钟祥。从4岁起，父亲白天干活，晚上教他读书写字，母亲就在一旁纺纱、做鞋。1939年，钟祥沦陷。严传梅“除了偷和抢，什么能挣到生活就干什么”。

每次赶集，严传梅都去看拉洋片。“洋片放的是日军在中国烧杀淫掠。”严传梅闭上眼睛，那段生灵涂炭、悲惨屈辱的岁月仿佛又涌到眼前，良久，眼里淌出了泪。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拉洋片的是中共地下党员。”严传梅睁开湿润的眼睛，接着说。

在地下党员的介绍下，14岁的严传梅加入了抗日十人团。这是中共党员发动群众抗日的组织，没枪可配，每个人往袜子里藏一把匕首，作为武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袜子。”严传梅说。

1941年11月，严传梅宣誓入党。新四军办的小学，让他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课堂。可战火的燎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我不能只顾自己读

书，把侵略者打跑了，才能让更多人读上书。”1942年8月，严传梅放下书，拿起枪，当兵上战场。

说到枪，严传梅最“馋”的是子弹。1943年1月的一次战斗中，严传梅担任突击任务，可步枪里只有3颗子弹。连长毛世发说：“同志们，别看咱们枪里子弹少，敌人的枪里有75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就有子弹了！”战士们被连长这样激励，作战非常英勇。

子弹少，就要打得准。战士们只要有空就进行军事训练，用古代“神箭手”的标准练习瞄准，子弹要能“穿叶间”。

真没子弹了，就要徒手搏击。除了刺杀术、搏击术，战士们还要训练“自身保存隐蔽术”，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首先要观察，哪里能隐蔽，哪里能掩护，哪里可能藏匿敌人，哪里可能遇到突然袭击。然后要考虑怎么打枪、怎么用刀……”这位95岁的老人滔滔不绝，岁月不曾磨灭抗日记忆。

“有人说当兵的都是大老粗，我不赞同。武术也是一种技术，怎么出拳出腿，打腿还是打腿，用膝盖还是用肘击，这一切如果不靠缜密又迅捷的思维，怎么能打倒敌人？”严传梅青筋盘虬的手紧握成拳，仿佛攥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严传梅从没给儿女讲过自己的战功，却反反复复讲过战友的故事。每次讲，都和着泪与叹息。

1943年，钟祥。严传梅所在的新四军游击队，离最近的日军仅3公里远，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

战士们一个月吃一次肉。那天，是吃肉的日子，全班都围过来。严传梅的战友陆国安，刚夹起一块肉，还没放进嘴里，枪响了，敌人来了！陆国安放下筷子就冲上去，却再也没回来。他牺牲了。

“陆国安比我大两岁，是我的老乡，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家里还有一位老父亲。”严传梅语速变得很慢，“那口肉，他终究没吃进嘴里”。

传奇行动

严传梅出色完成过一次颇为传奇的行动。他带着4名战士深入日军据点，活捉了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然后全身而退。

那个汉奸常引着日军到周围村庄扫荡、奸淫妇女，百姓恨透了他。严传梅见过他的面，主动申请执行刺杀任务。出发前，严传梅和战友们每人各带一颗手榴弹，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没打算活着回来。

那是1943年11月，据点东西长、南北短，有4条路可进出——老人记得很清楚。他们想方设法，巧妙地绕过了日军哨兵，捉住了汉奸。先把汉奸的嘴堵住，拿刺刀对着他，让他不要动，然后携着汉奸轻往外转移。

一名哨兵发现了他们！危急之中，侦察通讯班班长孔传国给了对方一刀。听到动静，军营一片喧哗，严传梅和战友拾起倒地哨兵的枪，边打枪边撤离，撤出后，把一颗手榴弹投向了敌军据点。

锄奸之后，位于今天湖北荆门市东宝区和钟祥交界处的北山革命根据地，安生了很长时间。



严传梅近照。受访者供图

立特等功

打跑了侵略者，严传梅又参加了淮海战役，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直属解放大队第二连连长兼指导员。在百余天的战斗中，第二连伤亡严重，却始终保持着一个连的战斗力，甚至打垮了敌军一个营。他，立了特等功。

彼时，敌军主要配备美式武器装备，地上坦克轮番进攻，天上飞机俯冲扫射。而我军的装备大部分是落后的老式枪。战士们往瓶子里灌满汽油，再备好炸药，专朝坦克的铰链投掷，来砍断“铁乌龟”的“腿”；行军时刻注意隐蔽，来欺瞒“空中堡垒”的“眼”……战士们虽绞尽脑汁，但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伤亡很大。

一场硬仗下来，连队把俘虏集中起来教育。严传梅也不照本宣科，直接拿身边的战士当“教材”。许多战士都是解放区的农民，讲起自己翻身做了主人的经历。“我解放了，来当兵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解放！”

往往几句话，就说得上俘虏们痛哭流涕，擦干眼泪，就说要加入共产党军队，要“报仇”。

没有新军装，就扯个布条，写上部队、姓名，领上枪弹，立刻就上前线。

第十一旅属于主攻部队，战斗一旦打响就只能攻上去，不能撤下来，必须打到底。在战斗激烈的情况下，补充兵员、保持部队战斗力就异常重要。打淮海战役时，严传梅任侦察连连长兼指导员，他的连去了约140人，最后“初始队伍”只剩下约10人。但靠着解放战士，依然撑起了一个连的战斗力，一直打到战役胜利。

严传梅荣膺特等功，并获得一枚宝贵的“人民功臣”奖章。

渡江战役中，作为侦察连连长的严传梅，让渡江战士们用双手划水，使船只加速通过江面，降低中弹风险。经此重要一役，侦察连

未受大的损失，严传梅的军功簿上，又多了一张“大功”奖状。

严传梅的档案里，记载着13次军功，但大部分奖章、奖状，都因过长江时战马牺牲、跌入江中，随水而逝。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拼来的荣誉“没了”，严传梅并不心疼。

“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人，哪还在乎奖章丢没丢呢？”

严传梅总说自己是“该死没死掉的”。双堆集战役中，一天半夜，战士们挖工事，严传梅让一个战士往战壕里面站，自己在最外面站岗。那位战士却把严传梅往里面护，还打趣说：就你不怕死啊？“怕死”对我们当兵的来说，是最侮辱人、最难听的一句话。”严传梅当时一听，只好连连说，“好好好，你来站岗”。

结果，突如其来的敌机扫射，击穿了那位战士的生命。“本来应该我死的。”严传梅喃喃地重复着。

“我的通讯员、司号员都救过我的命，自己却中弹牺牲。他们推开我、用胸脯挡住我时喊的‘危险’，是我听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严传梅又一次老泪盈眶，“我是战争的幸存者，我替战友们而活！”

戎马岁月

抗日战争时，严传梅经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淮海战役时反而吃得上饭，因为有“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支持与拥护。在严传梅的记忆中，还能看得到一眼望不到头的支前“板车大军”，听得到村庄日夜响起的磨房声，闻到烙饼的香味，“老百姓把饼包好，一刻不停送到前线来，饼到嘴边还是热乎乎的”。

“我们打胜仗，多亏了老百姓。人民就是江山，这话说得大对了！”这位老党员激动起来，“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人民”。

由于“随时准备牺牲”，严传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才结婚，妻子余从智当年是一名女炮兵。“后年就是我们结婚70周年了，今年是我们相识70周年。我们俩一直很好。”铁汉心中亦有浪漫柔情。

在20世纪50年代的金门炮战中，严传梅的腰椎断裂，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到坑道里去”。打仗不到坑道里去？还准备活多久啊？严传梅这样想着，照样下坑道，落下终身风湿关节炎，并且再不能负重。

不久，已任团宣传教育股股长的严传梅，上级有意提拔其为政治部主任，当团级干部。严传梅诚恳地向组织说：不行。

“我有腰伤，不能负重。营级干部算是中层领导，直接面向基层战士，我不能身先士卒，怎么能行！”战功赫赫的英雄，说到这里满面羞惭。

1959年，严传梅不舍地脱下军装。转业时，能填报三个志愿，严传梅第一个写的是去新疆，因为“那里条件艰苦”；第二个写

的是去河南平顶山，因为“那里有煤矿，能建设祖国”；第三个写的是服从分配。

组织考虑到余从智早已分配到武汉工作，将严传梅分配到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严传梅修了“武”，又开始修“文”。

捐出积蓄

在武水，严传梅主持过政治工作，负责过干部审查，当过档案科科长；后来校部党支部改选，他被大家选为支部书记，三年困难时期，还抓过食堂工作。后来调任农田水利工程系党总支书记，他协调学校资源，为地方解决了水患问题，泽被至今。

无论在哪个战场、哪个岗位，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试卷”，严传梅都力争“得高分”。而自己功绩斐然的军旅生涯，随着仅存的军功状，一起被严传梅尘封在皮箱中，对妻子儿女也绝口不提。直到2020年病情一度恶化，严传梅才将皮箱托付给儿女：“这是我一生的纪念。”

只留下“纪念”，不留钱——这位一双80元的皮鞋穿了十几年、和老伴旅游只住过一次三星级酒店就嫌“太奢侈”的老干部，给老伴留下生活费后，为武汉抗疫捐出3万元，又嘱咐儿女把其余全部积蓄交给党组织。说到捐款，老人反而很惭愧，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够了。“这些钱，就是一点心意，不知怎么，被大家知道了。”

严传梅曾在党史教员训练班中专门学过党史，还系统学过中国通史，善于结合现实，给同学们上党史课。直到现在，严传梅还会在自己所住的武汉大学职工宿舍内，给研究生讲党史。白发苍苍的“90后”和青春勃勃的“90后”，聊得津津有味。

今年“七一”，严传梅戴着眼镜，全程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听到这句话，严传梅高兴得直流眼泪。“我当年在云南巍山驻防时，老百姓挑着柴火去集市上卖，女的穿两件棕树皮，男的穿一件棕树皮。有户人家，没米没菜，只有一点甜酱，全家老少一人舔一口。”严传梅说，“短短百年，天翻地覆！现在再去云南，想不到啊，发展这么快啊！大街上的姑娘小伙真漂亮啊！过去缺吃少穿，现在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许多国家响应。这太好了，我心里太高兴了！”

几十年来，严传梅不提自己的战功，却把战友们的英勇无畏记得清清楚楚。许多战友牺牲了，严传梅替他们看到了如今盛世。“我想对他们说：你们没白牺牲，你们是如今幸福生活的奠基人！过去再苦，值得！再累，值得！”

采访最后，这位女儿眼中“非常了不起的父亲”，儿子心中“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郑重地对记者说：“我入党时，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做到了。到了我这个年纪，回首一生，自己心里能过得去，是很好的。”

本报记者吴植、谭元斌、乐文婉

她是新中国空降兵部队的第一批女空降兵之一。她是拿出毕生积蓄捐给家乡发展教育事业的道德楷模。她是一名从不懈怠的老共产党员。

88岁，马旭的步履变得有些蹒跚，瘦弱的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她依然日复一日地坚持运动、坚持学习、坚持科研，甚至强烈盼望“再跳一次伞”。初心不改、壮心不已，用在这位老奶奶身上再合适不过。

不尽的家国大爱

“奶奶，奶奶！”在马旭的家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木兰县，孩子们一看到她，便喊着涌上来，围住她，让老人直言“感觉自己像个明星”。

今年6月底，马旭回了一趟家乡。说起家乡巨变，老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接连使用“翻天覆地”“超乎想象”等词语来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很有精神，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马路宽阔平整，两旁绿树成荫，高楼一栋一栋，别说跟过去比，就连跟我2019年回去看时，都不一样。”她说。

此行的起因，是马旭和老伴颜学庸捐款修建的木兰县马旭文博艺术中心今年上半年建成，夫妇俩受邀回去看看。身穿蓝色迷彩服的马旭英姿飒爽，她亲自拉下红色缎带，为中心揭牌。

毕生节俭仅为一次奢侈。2018年，马旭和颜学庸为家乡木兰县教育局捐款1000万元。这笔巨款，是两位老人一辈子积攒的工资、理财和专利收入。为了凑够整数，他们还借了些钱。

占地面积4679平方米、展陈面积2735平方米的马旭文博艺术中心，以文字、图片与老物

件展示了马旭的生平事迹、东北抗日联军在木兰县的战斗经历、木兰县金源文化以及马旭第二家乡武汉市黄陂区的风土人情。

自今年5月1日试运行以来，马旭文博艺术中心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建筑第三层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内含器乐室、声乐室、多功能教室、多功能排练厅和图书馆，馆内藏书近6000册，免费向学生开放。暑期，不少孩子来此看书、学琴、跳舞和剪纸。

“物质财富的多少，对我们两个老人的幸福感来说，并不重要。幸福在于对人民有所贡献。我一个人本事小，但把钱捐给家乡发展教育，帮助孩子们了解历史、培养兴趣爱好、学习本领，将来他们就能把家乡、祖国建设得更好，我就觉得值。”谈起省吃俭用捐款的义举，马旭说自己和老伴“从不后悔”。

“捐钱的想法不是一时的。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我差点饿死。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跟党走、参军入伍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我要报恩。”她说。

不解的伞兵情缘

“我身体硬朗着呢，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跳一次伞。”说这句话时，马旭的双眼神采奕奕，嗓门很高。年近九旬的老人身体已不如前，但她的信念和壮志丝毫未减。

如今，离马旭告别母亲参军的那一天，已过去70多年。

马旭幼年就听母亲讲过穆桂英、花木兰等巾帼英雄的传说，加之受到东北抗联在家



马旭在家中跳舞。本报记者肖艺九摄

乡浴血奋战这段历史的影响，她从小对参军有着特别的向往。

1947年，年仅14岁的马旭在家乡入伍。不久，她获得机会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1956年3月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至原武汉军区总医院担任军医。

1961年，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建为空降兵部队，马旭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至空降兵部队从事卫勤保障工作。

在空降兵部队，作战官兵执行跳伞任务，后勤保障官兵负责提供各方面保障。但马旭觉得，她一定要会跳伞，才能更好地为战士们提供保障。然而，由于身材小、体重轻，她屡次申请参加跳伞训练都未获批准。

她不死心，坚持每天晚上自己练习跳伞动作，一练就是十多次乃至几十次。半年后的一次考核中，她用出色的表现获得训练资格，成为我国首批女空降兵之一。此后20多年间，她执行空降任务的足迹遍布高原、山川、大江、森林。

离休后，她依然与跳伞有着不解之缘。2015年，当时82岁的她与老伴在湖南衡阳挑战了滑翔伞运动。她依然情系空降兵部队，直到现在，还不时与小战士聊天了解部队近况。

注意到有伞兵脚踝受伤，马旭和老伴先后设计6套方案，画了几百张图纸，研发出一种“充气护踝”。此后，他们又研发了“单兵高原供氧背心”。这两项成果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马旭还和老伴撰写了《空降兵生理病理学》《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等材料，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有不少小战士看了这些材料对我说：‘奶奶，你做的这些事情真了不起’，‘你是我们的榜样’。但我觉得一代更比一代强，我还要继续努力，向年轻人学习。”马旭说。

不懈的学习动力

在武汉家中，为寻找资料，个子瘦小、身穿军装的马旭搬着一大摞书报材料，艰难而执着地挪动着步子。她脚上的大头皮鞋，格

外醒目。这双鞋不知穿了多少年，鞋底脱胶了，她用胶水粘好接着穿。

离休30多年来，马旭和老伴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家中陈设简单，都是上了年头的家具。家里有一个七八层高的中药柜。打开柜子抽屉，柜内并无中药，而是医书、外语教材和党史书籍。

柜子前的方桌，是两位老人学习的地方。他们把读书看报当作每天的“必修课”，有时一直看到晚上11点多才熄灯就寝。

马旭说：“党史、国史是宝贵的财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一路走来，如今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这个年纪，也要思考如何在新征程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多年来，马旭和老伴做了厚厚几沓剪报。在这些几寸见方的纸片上，能看到老人阅读时刻的密密麻麻的红线。老人还翻开今年一则关于“火星车为啥叫祝融号”的报道，“如果不是读书看报，我就跟不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了”。

在一间卧室内，墙上、窗上和床头都贴着写有日语单词的卡片。几年前，马旭报考了药理学硕士研究生。但对她来说，外语一直是不小的挑战。

老人很乐观地与记者交流学外语的心得。“我看看墙上贴的单词，就根据单词发散思维，用日语跟自己对话，然后再翻书检查是否用得正确。”近年来，二老开始钻研健身器械。他们自行设计、定制了两台器械，命名为“旋梯”和“滚梯”。

采访接近尾声时，金色的夕阳透过窗户照进家中，洒在马旭坚毅的脸上。“我希望自己学到老、贡献到老，这样才能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她说。